


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 总主编 曾宪义 王利

总主编
曾宪义
王利明

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主编 张小虎

犯罪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曾宪义 王利明

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犯罪学

主编 张小虎

撰稿人 (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

张小虎 侯刚 兰迪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犯罪学/张小虎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6
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7684-0

I. ①犯… II. ①张… III. ①犯罪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D9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8427 号

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总主编 曾宪义 王利明

犯罪学

主编 张小虎

Fanzui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5.25 插页 1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56 000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曾宪义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所作出的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文明发展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法律制度乃是维系社会、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体现。

由于发展路径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东方社会与西方世界对于法律的意义、底蕴的理解、阐释存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曾比较注重法律的制定与完善。中国古代虽然被看成是“礼治”的社会、“人治”的世界，被认为是“只有刑，没有法”的时代，但从《法经》到《唐律疏议》、《大清律例》等数十部优秀成文法典的存在，充分说明了成文制定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唯这些成文法制所体现出的精神旨趣与现代法律文明有较大不同而已。时至 20 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东西文化交流加快，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的、传统的社会体制向近现代文明过渡，建立健全的、符合现代理性精神的法律文明体系方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的数百年间，在西方、东方各主要国家里，伴随着社会变革的潮起潮落，法律改革运动也一直呈方兴未艾之势。

从历史上看，法律的文明、进步，取决于诸多的社会因素。东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均充分证明，推动法律文明进步的动力，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同时，法律内容、法律技术的发展，往往依赖于一大批法律专家以及更多的受过法律教育的社会成员的研究和推动。从这个角度看，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发展，对于法律文明的发展进步，也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在现代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中，开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肇始于 19 世纪末的晚清时代。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 1895 年）开办的天津中西学堂，首次开设法科并招收学生，虽然规模较小，但仍可以视为中国最早的近代法学教育机构（天津中西学堂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又发展为天津大学）。三年后，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有“维新骄子”之称的梁启超先生即在湖南《湘报》上发表题为《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的文章，用他惯有的富有感染力的激情文字，呼唤国人重视法学，发明法学，讲求法学。梁先生是清代末年一位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巨子，在他辉煌的学术生涯中，法学并非其专攻，但他仍以敏锐的眼光，预见到了新世纪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发展。数年以后，清廷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宣布实施“新政”，推动变法修律。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在近十年的变法修律过程中，在大量翻译西方法学著作，引进西方法律观念，有限度地改造中国传统的法律体制的同时，也开始推动中国早期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20 世纪初，中国最早设立的三所大学——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均设有法科或法律学科目，以期“端正方向，培养通才”。1906 年，应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等人的奏请，清政府在京师正式设立中国第一所专门的法政教育机构——京师法律学堂。次年，另一所法政学堂——直属清政府学部的京师法政学堂也正式招生。这些大学法科及法律、法政学堂的设立，应该是中国历史上近代意义上的正规专门法学教育的滥觞。

自清末以来，中国的法学教育作为法律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社会的曲折发展，经历了极不平坦的发展历程。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社会一直充斥着各种矛盾和斗争。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沉重压力之下，中国人民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花费了无穷的心力，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从客观上看，长期的社会骚动和频繁的政治变迁曾给中国的法治与法学带来过极大的消极影响。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为标志，中国社会从政治阵痛中清醒过来，开始用理性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国的过去，规划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中国由此进入长期稳定、和平发展的大好时期，以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为背景，中国的法学教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从宏观上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首先,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在中国法学界迅速清除了极左思潮及苏联法学模式的一些消极影响,根据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国家民族的共识,这为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其次,随着法学禁区的不断被打破、法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学学科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理论法学、部门法学各学科基本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框架,一些随着法学研究逐渐深入而出现的法学子学科、法学边缘学科也渐次成型。1997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原有专业目录进行了又一次大幅度调整,决定自1999年起法学类本科只设一个单一的法学专业,按照一个专业招生,从而使法学学科的布局更加科学和合理。同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了法学专业本科教学的14门核心课程,加上其他必修、选修课程的配合,由此形成了一个传统与更新并重、能够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教学体系。法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设置、课程教学和培养体系也日臻完善。再次,法学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层次日趋齐全,结构日臻合理。目前中国有六百余所普通高等院校设置了法律院系或法律本科专业,在校本科学生和研究生已达二十余万人。除本科生外,在一些全国知名的法律院校,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学博士研究生已经逐步成为培养的重点。

众所周知,法律的进步、法治的完善,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一方面,现实社会关系的发展,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为法律的进步、变迁提供动力,提供社会的土壤。另一方面,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发展,直接推动法律进步的进程。同时,全民法律意识、法律素质的提高,则是实现法治国理想的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在社会发展、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等几个攸关法律进步的重要环节中,法学教育无疑处于核心的、基础的地位。中国法学教育过去二十多年所走过的历程令人激动,所取得的成就也足资我们自豪。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21世纪,我们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和更灿烂的前景。“建设世界一流法学教育”,任重道远。

首先,法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以法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也就成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势必要对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目标已顺利实现。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家和社会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真正建立、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政治体制的完善、全民道德价值的重建、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等等,已经开始浮现出来。这些复杂问题的解决,无疑最终都会归结到法律制度的完善上来。建立一套完善、合理的法律制度,构建理想的和谐社会,乃一项持久而庞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全民族的智慧和努力。其中的基础性工作,如理论的论证、框架的设计、具体规范的拟订、法律实施中的纠偏等等,则有赖于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高素质人才特别是法律人才的养成,而培养法律人才的任务,则是法学教育的直接责任。

其次,21世纪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纪。20世纪中叶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并由此引发许多人类从未面对过的问题。就法学教育而言,在21世纪所要面临的,不仅是教学内容、研究对象的多元化问题,而且还有培养对象、培养目标的多元化、教学方式的多元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法学界去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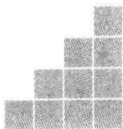
考、去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建立于 1950 年,是新中国诞生后创办的第一所正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以其雄厚的学术力量、严谨求实的学风、高水平的教学质量以及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全国法学教育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开始跻身于世界著名法学院之林。据初步统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已经为国家培养法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一万余人,培养各类成人法科学生三十余万人。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学术优势,在现职教师中,既有一批资深望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法学前辈,更有一大批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优秀中青年法学家。这些老中青法学专家多年来在勤奋研究法学理论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国家的立法、司法实践,对国家法制建设贡献良多。

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研究协商,决定结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术优势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力量,出版一套“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自 1998 年开始编写出版本科教材,包括按照国家教育部所确定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和其所颁布印发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基本要求》而编写的 14 门核心课程教材,也包括法学各领域、各新兴学科教材及教学参考书和案例分析在内,到 2000 年 12 月 3 日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召开举世瞩目的“21 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之时,业已出版了 50 本作为 50 周年院庆献礼,到现在总共出版了 80 本。为了进一步适应高等法学教育发展的形势和教学改革的需要,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决定将这套教材扩大为四个系列,即:“本科生用书”、“法学研究生用书”、“法律硕士研究生用书”以及“司法考试用书”,总数将达二百多本。我们设想,本套教材的编写,将更加注意“高水准”与“适用性”的合理结合。首先,本套教材将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具有全国影响的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领衔,约请全国高校优秀学者参加,形成学术实力强大的编写阵容。同时,在编写教材时,将注意吸收中国法学研究的最新的学术成果,注意国际学术发展的最新动向,力求使教材内容能够站在 21 世纪的学术前沿,反映各学科成熟的理论,体现中国法学的水平。其次,本套教材在编写时,将针对新时期学生特点,将思想性、学术性、新颖性、可读性有机结合起来,注意运用典型生动的案例、简明流畅的语言去阐释法律理论与法律制度。

我们期望并且相信,经过组织者、编写者、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法学教材将以其质量效应、规模效应,力求成为奉献给新世纪的精品教材,我们诚挚地祈望得到方家和广大读者的教正。

2006 年 7 月 1 日



序 言

法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并居于先导性的战略地位。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新世纪、新阶段，法学教育不仅要为建设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服务，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培养大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高层次法律人才。近年来，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科数量增长很快，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培养层次日渐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涵盖本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研究生、法学博士研究生的完整的法学人才培养体系，接受法科教育已经成为莘莘学子的优先选择之一。随着中国法治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法学教育的事业大有可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前途充满光明。

教育的基本功能在于育人，在于塑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法学教育的宗旨并非培养只会机械适用法律的“工匠”，而承载着培养追求正义、知法懂法、忠于法律、廉洁自律的法律人的任务。要完成法学教育的使命，首先必须认真抓好教材建设。我始终认为，教材是实现教育功能的重要工具和媒介，法学教材不仅仅是法学知识传承的载体，而且是规范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对法学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一，法学教材是传授法学基本知识的工具。初学法律，既要有好的老师，又要有好的教材。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一套好的教材，能够高屋建瓴地展示法律的体系，能够准确简明地阐释法律的逻辑，能够深入浅出地叙述法律的精要，能够生动贴切地表达深奥的法理。所以，法学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向导，是学生步入法律殿堂的阶梯。如果在入门之初教材就有偏颇之处，就可能误人子弟，学生日后还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来修正已经形成的错误观念。

第二，法学教材是传播法律价值理念的载体。好的法学教材不仅要传授法学知识，更要传播法律的精神和法治的理念，例如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尊重权利的观念。本科、研究生阶段的青年学子，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阶段，一套优秀的法学教材，对于他们价值观的塑造和健全人格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法学教材是形成职业共同体的主要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赖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生成。一套好的法学教材，向法律研习者传授共同的知识，这对于培养一个接受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的法律思维、共同的话语体系的法律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四，法学教材是所有法律研习者的良师益友。没有好的教材，一个好的教师或可弥补教材的欠缺和不足，但对那些没有老师指导的自学者而言，教材就是老师，其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教材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注重，对学术成果的形式优先考虑的往往是专著而非教材。在不少人的观念中，教材与创新、与学术精品甚至与学术无缘。其实，要真正写出一部好的教材，其难度之大、工作之艰辛、影响之深远，绝不低于一部优秀的专著，它甚至可以成为在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发挥作用的传世之作。以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为例，所谓法学阶梯，即法学入门之义，就是一部教材。但它概括了罗马法的精髓，千百年来，一直是人们研习罗马法最基本的著述。日本著名学者我妻荣说过，大学教授有两大任务：一是写出自己熟悉的专业及学术领域的讲义乃至教科书；二是选择自己最有兴趣、最看重的题目，集中精力进行终生的研究。实际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写出一部好教材，必须要对相关领域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还要能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将问题讲清楚、讲明白。没有编写教材的基本功，实际上也很难写出优秀的专著。当然，也只有对每一个专题都有一定研究，才能形成对这个学术领域的完整把握。

虽然近几年我国法学教育发展迅速，成绩显著，但是法学教育也面临许多挑战。各个学校的师资队伍和教学质量参差不齐，这就更需要推出更多的结构严谨、内容全面、角度各有侧重、能够适应不同需求的法学教材，为提高法学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法学教育健康发展提供前提条件。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始终高度重视教材建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正规的法学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最早开设了社会主义法学教学课堂，编写了第一套社会主义法学讲义，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法学本科生和各学科的硕士生、博士生，产生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法律人才，并为法学事业的振兴和繁荣作出了卓越贡献，也因此成为引领中国法学教育的重镇、凝聚国内法律人才的平台和沟通中外法学交流的窗口，并在世界知名法学院行列中崭露头角。为了对中国法学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出版一套体现我们最新研究成果的法学教材。

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组织编写了本套教材，其中包括本科生用书、法律硕士研究生用书、法学研究生用书和司法考试用书四大系列，分别面向不同层次法科教育需求。编写人员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为主，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整体的研究实力和学术视野。相信本套教材的出版，一定能够为新时期法学教育的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是为序。



前 言



1764年，意大利学者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贝卡利亚发表了《论犯罪与刑罚》一书，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刑法学的形成。1876年，意大利学者刑事近代学派的鼻祖龙勃罗梭出版了《犯罪人论》，由此开辟了现代犯罪学的领域。尽管犯罪学与刑法学一脉相承，然而两者在研究视角、研究重心、研究方法等方面却各有特色，也正因为此，构成了犯罪学学科体系特征。

19世纪，犯罪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在欧洲；20世纪，犯罪学研究的学术中心逐渐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而在我国，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实质性的发展，只是近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步推进。美国犯罪学理论与实践的兴起与繁荣，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学沃土的滋润，并在严谨与求实的学术氛围中，构成了一定的思想整合，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流派。与此不同，我国的犯罪学并未受到社会学的有力支持，并受过度“创新”与“跨越”氛围的影响，虽有重大发展但专业特征薄弱。

犯罪学是刑事法学的基础，也是遏制犯罪的核心学科。犯罪学的思想理念推动着最好刑事政策的奠定，而最好刑事政策又引导着合理刑法规范的构建；刑法学基于事后合理的刑法处置遏制犯罪，而犯罪学基于事前罪因机制的明晰直接针对犯罪预防与控制。在我国目前犯罪率阶位攀高与居高不下的犯罪态势下，加强与彰显犯罪学研究尤为必要。

本书旨在简洁、系统、准确介绍犯罪学的基本知识，力求做到：（1）体系完整：全面勾勒犯罪学的知识体系，统揽犯罪学的全貌。（2）重点突出：择取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键。（3）界说准确：着力梳理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基于知识的对比而予精准与明确的阐释。（4）简洁清晰：语言表述精练，逻辑线索清晰，层次结构简约。（5）资料翔实：广泛搜集中外相关的理论成果，把握同类研究的思想前沿。

全书的框架体系由主编确定，其中，总论由主编撰写，分论各章节、目由主编限定，最后全书由主编通读定稿。本书各章写作分工如下（以章节先后

为序):

张小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一章至第四章。

侯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第五章。

兰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生):第六章。

张小虎

2013年9月25日

目 录

上篇 犯罪学总论

第一章

犯罪学的基础知识	3
第一节 犯罪学的概念	3
第二节 犯罪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9
第三节 犯罪学的理论体系	17
第四节 犯罪学的研究方法	20

第二章

犯罪的本质与现象	29
第一节 犯罪本质的基本层次	29
第二节 犯罪本质的犯罪学界定	32
第三节 犯罪现象的表现与测量	38
第四节 我国犯罪率的波动状况	52

第三章

犯罪原因机制	83
第一节 犯罪原因的典型学说	83
第二节 犯罪原因的基本观念	92
第三节 犯罪原因的社会因素	104
第四节 当代中国社会罪因机制	114

第四章

犯罪对策	119
第一节 犯罪对策的知识构成	119

第二节	犯罪预防与控制的观念	121
第三节	应对犯罪的刑事政策思想	131
第四节	应对犯罪的刑事处置措施	161

下篇 犯罪学分论

第五章

	暴力犯罪	173
第一节	暴力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173
第二节	暴力犯罪的状况与特点	178
第三节	暴力犯罪的原因	183
第四节	暴力犯罪的对策	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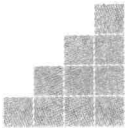
第六章

	高新科技犯罪	193
第一节	高新科技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193
第二节	高新科技犯罪的状况与特点	200
第三节	高新科技犯罪的原因	212
第四节	高新科技犯罪的对策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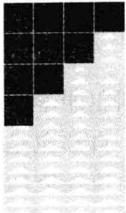
上篇

犯罪学总论


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犯罪学



第一章



犯罪学的基础知识



常考知识点

- 犯罪学的概念
- 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
- 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的关系
- 犯罪学的理论体系
- 犯罪学的研究方法

犯罪学基础知识阐释统领犯罪学知识体系的有关概念、引论等，具体内容包括：犯罪学概念、犯罪学与相邻学科关系、犯罪学理论体系、犯罪学研究方法等。

第一节 犯罪学的概念

犯罪学，Criminology，在词源上由拉丁文 Crimen（犯罪、罪行）与 logos（学说、知识）组合而成。法国人类学家保罗·托皮纳尔（Paul Topinard），在 1879 年出版的《人类学》一书中首次使用“犯罪学”这一术语，意思是研究犯罪行为问题的科学。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76 年在米兰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犯罪人论》，1878 年他在都灵又出版了《犯罪人论》的第二版，强调实证学的研究方法，注重犯罪人的生物学特征，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他为此名声大振，被誉为“犯罪学之父”。此后犯罪学这个术语被广泛地采用。意大利犯罪学家拉斐尔·加罗法洛（Raffaele Garofalo），于 1885 年出版了题为《犯罪学》的著作，以犯罪人的人类学因素、社会因素、应对犯罪的合理刑事措施作为核心内容，成为第一部以犯罪学命名的学术著作。

犯罪学，是融合各种有关学科的知识，阐释犯罪本质，表述犯罪现象，揭示犯罪原因，寻求犯罪对策的刑事科学。犯罪学包括：中国犯罪学、外国犯罪学、比较犯罪学、沿革犯罪学；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生物学、被害人学等。刑法学、监狱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察学等，是犯罪学的相关学科，它们共同构成刑事科学。具体地说，犯

罪学概念涉及犯罪学的基本内容、背景知识结构、事前事实科学、内在学科结构、外在相关学科等方面。兹予分述如下：

一、基本内容

犯罪本质、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是犯罪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内容。

(一) 犯罪本质

犯罪本质确定犯罪的内在规定性，具体划定犯罪现象的边界。例如，意大利犯罪学家加罗法洛对于法定犯与自然犯的区分，强调自然犯才是犯罪学应予关注的对象。自然犯是真正的犯罪，是侵害人类最基本的正直情感与怜悯情感的行为。^① 犯罪本质是颇值探究的理论问题，它既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又表现为一种社会主体的价值观念。并且，犯罪本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在不同的社会群体等，也有着各不相同的表现。同时，鉴于犯罪学与规范刑法学研究重心与视角的差异，犯罪学的犯罪本质也独具特点。刑法学研究犯罪本质，展示刑法规范的内在价值属性，回答刑法为什么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的问题；犯罪学研究犯罪本质，揭示犯罪事实的社会应然特征，回答刑法应当将哪些行为规定为犯罪的问题。因此，犯罪学犯罪本质的揭示，奠定刑法学犯罪界定的基石，提供刑法立法的指导，并以观念形态更为间接地波及司法。

(二) 犯罪现象

犯罪现象提供犯罪学知识体系的最基本的经验性基础。例如，我国目前犯罪率呈阶位攀高的态势^②，由此促使探究其中的原因机制，而转型期有关社会现象及其与犯罪率波动关系的事实表明，社会分化中意识价值、社会分层的社会结构失衡，尤其是制度规范的疲软是核心的致罪因素。这一研究历程也昭示，在犯罪学研究中应当遵循宏观与微观的明晰、实证与思辨的结合、动态与静态的视角、常态与反常的区别等等犯罪学研究的基本规则。犯罪学揭示犯罪的形成机制，而犯罪现象及其因果关系是这一形成机制的重要表现。这些犯罪现象具体包括：犯罪形成结果的现象：犯罪行为、犯罪人、犯罪率等的表现形式；犯罪形成过程的现象：决定犯罪的生物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表现形式等等。同时，犯罪学研究以控制和预防犯罪为终极目标，犯罪学不仅研究法定犯罪现象，而且研究与法定犯罪现象密切相关的应然犯罪现象、违法越轨现象、社会危险行为现象等。

(三) 犯罪原因

犯罪原因揭示犯罪因素与犯罪现象之间肯定性的因果关联；犯罪原因属于犯罪学研究的核心，狭义的犯罪学甚至将犯罪原因学等同于犯罪学。例如，美国犯罪学之父埃德温·萨瑟兰（Edwin Sutherland）的差异交往论。^③ 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犯罪是掌握着刑事权力的国家所作的政治性界定。在具有文化冲突的社会里，人们对犯罪的界定可能互不相同，被某一文化群体界定为犯罪的行为，可能被另一文化群体认为是正当的行为。犯罪的

^① 参见 [意] 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王新译，2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② 详见张小虎：《我国当前犯罪率阶位攀高的社会安全警示》，载《犯罪研究》，2007（6）。

^③ 萨瑟兰（1883—1950）于1924年出版了专著《犯罪学》，该著作在1934年第二版时更名为《犯罪学原理》，在1939年第三版时提出了差异交往理论（theory of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1978年，唐纳德对萨瑟兰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修正，又出版了第十版。